

近代福州蓮宅林氏鑄造家族及其作品流傳
——臺灣與南洋諸地之考察

李建緯

逢甲大學歷史與文物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摘要

清代大量閩粵漢人移入臺灣，也將原鄉的信仰與器物帶入臺灣。臺灣因早期金屬鑄造工藝仍未成熟，因此大型金屬供器多半是向東南沿海地區訂製。由於這些器物製作門檻高、價格昂貴，多數與宗教功能有關，捐獻者常會落款以示虔誠，其中附帶年款與作坊款識之金屬文物，不僅提供了年代，也標註著產地訊息。透過臺灣清代傳世金屬鑄器窺知，福州市鼓樓區蓮宅曾居住一批由林姓家族組成的鑄坊聚落。筆者田野調查發現，臺灣保存不少與蓮宅林姓家族有關之文物，相關文物更外銷到南洋華人地區，顯示蓮宅在 19 世紀後半形成了具有獨特性的鑄造聚集地。隨著宗教信仰的淡薄與戰爭型態的改變，這批鑄造工匠在 20 世紀後半逐漸退出舞臺。

本文主要透過臺灣蓮宅鑄造文物判斷，釐清其家族匠首成員、作坊活躍年代、產品產銷範圍以及其生產方式。根據筆者所收集的蓮宅或福州林姓家族落款，蓮宅鑄器種類有梵鐘、香爐與火砲。透過年款可知，這批家族早期生產宗教文物，道光 22 年（1842）以後轉向鑄造火砲，背後反映的正是在中英鴉片戰爭後清廷對抗西方列強之需，僅透過引進西方武器已不敷使用，更體會到須強化中國自己的火砲鑄造技術以抗衡西方列強。在此時代背景下，可以理解為何原以梵鐘為主的林姓家族，其產品從宗教供器轉向鑄造武器的歷史成因。

再比對南洋的蓮宅文物進一步發現，不論是印尼或馬來西亞，蓮宅鑄器仍以梵鐘為大宗，有落款的梵鐘主要發現於印尼北蘇門答臘、楠榜、中爪哇

等地華人寺廟；馬來西亞則以西馬檳城為主，麻六甲也發現蓮宅風格之梵鐘。值得注意的是，清末以後臺灣反而未繼續向蓮宅訂製。一方面南洋華人當然不可能像蓮宅訂製火炮；另一方面也與中日甲午戰爭戰敗、臺灣於光緒 21 年（1895）以後納入日本統治，梵鐘逐漸轉向日本訂製有關。

關鍵字：福州蓮宅、林姓鑄造家族、梵鐘、火炮、南洋

壹、研究動機：重拾福州金屬鑄造工藝記憶

在工藝產地研究中，銘款提供了商品產銷的關鍵訊息。明清時期金屬文物常見有鑄人或作坊落款情形，其中被稱為中國四大鎮（江西景德鎮、河南朱仙鎮、湖北漢口鎮、廣東佛山鎮）中的廣東佛山，素來以鑄造聞名於世。¹不僅其生產的鑄器遍布於中國東南沿海的廣東、福建、香港、澳門、臺灣等地，甚至海外華人也見大量廣東佛山款的鑄鼎與梵鐘，佛山鑄造儼然成為中國清代外銷金屬文物的代名詞。

相較之下，明清時代以前的福州是否存在鑄造業？以福建省知名手工藝為對象如《圖說福建傳統手工藝與閩臺文物》²，或專以福州市為對象的《福州工藝美術》³，皆未將金屬鑄造工藝收錄其中。《圖說福建傳統手工藝與閩臺文物》提及福州工藝，僅有壽山石雕、脫胎漆器、漆畫與油紙傘，對金屬鑄造工藝則隻字未提。⁴至於《福州工藝美術》僅以福州開元寺（相傳建於南朝梁太清 3（549）年）的巨型鐵佛阿彌陀佛造像作為金屬工藝之代表作品——鐵佛通高 5.92 米，頭徑 1.45 米，專家研究其結構分成三層，包括原始鑄件、表面塗層、塗層貼上金箔。鑄造方式分別採用分段鑄造，部分採用蠟模鑄造，另也採用泥模或是砂模鑄造，其年代說法有唐末五代以及北宋元豐年間。⁵

除了前引資料，對於福州清代以前的鑄造業，大抵是通過傳世文物認識的：如湧泉寺藏經殿前兩廂房發現有宋代銅鼎、明洪武銅鐘、明宣德雙耳銅鼎，還發現有一口康熙 35 年款（1696）梵鐘，鐘身鑄有佛號與整部金剛波

1 朱培建編，《佛山明清冶鑄》（廣州市：廣州出版社），2009 年。

2 宋武、李艷、吳荻帆，《圖說福建傳統手工藝與閩臺文化》（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2018 年）。

3 陳揚富主編，《福州工藝美術》（福州：海峽書局，2010 年）。

4 宋武、李艷、吳荻帆，《圖說福建傳統手工藝與閩臺文化》，頁 15-35。

5 陳揚富主編，《福州工藝美術》，頁 28。

若羅蜜經共 6,372 字，重 2 噸，顯示鑄造技術非常純熟。⁶ 福州市鼓山靈源洞東側的湧泉亭（觀音亭，又稱龍頭泉亭）發現一件明萬曆 23 年（1595）由銅、鐵鑄造的觀音像，重達 101 斤之外，還有重達 434 斤的崇禎 10 年款（1636）之銅鐘。

民國以後，福州鑄造主要集中在福州吉祥山、水部、蓮宅一帶的鑄造和煉錫作坊，並以生產機械設備和日常生活用品為大宗。⁷ 網路上對蓮宅的認識甚為貧瘠：「蓮宅在民國時期有幾家鑄造作坊，還有二三家酒廠和舊油廠，廠坊屬手工操作，設備簡陋，經營規模小。」⁸ 這顯示今日對蓮宅鑄造業的認識，在人們記憶中已非常模糊。其實，福州蓮宅不僅在民國時期鑄造有民生用品和機械設備，早在清代便有大量供器輸往海外臺灣和南洋地區。位於福州鼓樓區這批鑄人，其生產的金屬文物雖無法與廣東佛山分庭抗禮，惟其鑄造的傳世文物數量龐大，形成具有特色的鑄造集散地，其中又以福州蓮宅的林姓家族為代表。⁹ 這個鑄造家族在 20 世紀後半逐漸步出歷史舞臺，甚至到了 21 世紀逐漸走出人們的記憶。¹⁰

福州蓮宅金屬鑄造工藝之所以無法載於史籍，一方面福州相關工藝著作係以尚存世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手工藝為對象；同時，就現況而言很難通過現地考察發掘蓮宅鑄造的原來樣貌。再加上上世紀福州市容經大幅度重新規劃後，¹¹ 蓮宅拆遷，鑄坊不存，僅留下「蓮宅村」或「蓮宅站」之地名，徒供

6 黃榮春編著，《福州市郊區文物志》（福州市：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 年），頁 99/141。

7 福建省福州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福州市志·第 3 冊》（北京：方志出版社，1999 年），頁 17-18。

8 引自「百度百科·水部街道」一條，2019 年 7 月 29 日點閱。

9 有關蓮宅以林姓為主鑄匠，究竟是僅屬匠幫或家族，筆者經詢問當地福州歷史學者與福州友人，多提及蓮宅過去居民皆屬林姓，大多具有宗族關係，此外，蓮宅林氏翻砂的承包工作方式也以設立協會方式呈現，不傳外人，故筆者認為他們應以「家族」稱呼之。

10 李建緯，〈臺中市萬和宮金屬鐘研究——試論其所反映的產銷問題〉，《文化資產保存學刊》第 35 期（2016 年 6 月），頁 62。

11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福建省福州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工作組編，《福州地方志（上）》（福州市：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福建省福州市委員會，1979 年），頁 86-89。

緬懷。職是之故，今日吾人對蓮宅鑄造業的認識，僅有透過傳世文物中落有鑄造年款與鑄造訊息者加以貼近。幸運的是，臺灣保存不少落有蓮宅人性家族的鑄款，就傳世文物種類而言，可分成梵鐘¹²、香爐與火炮¹³，相關文物分述如下。

貳、臺灣有關蓮宅鑄造文物種類

一、梵鐘

所謂的「梵鐘」即金屬圓體大鐘。一般而言，鐘體橫剖面有合瓦與圓體兩種，隨著橫剖面的不同，其聲音有所不同，如《夢溪筆談》〈補筆談卷一〉所云：

古樂鐘皆扁如合瓦，蓋鐘圓則聲長，扁則聲短。聲短則節，聲長則曲。節短處聲皆相亂，不成音律。後人不知此意，悉為圓鐘，急叩之多晃晃爾，清濁不復可辨。¹⁴

大型梵鐘普遍都是圓體型鐘體，因為圓體鐘的鐘腔大而中空，是很好的共鳴體，聲波可以在腔體內迴旋震盪，因而可形成響聲大、傳聲遠，並有水波漣漪相繼的效果，因此恢弘渾厚的鐘聲，可令聞者產生祥和安定的感受。在臺灣所見的宗教用鐘，佛教、道教皆有之。民間所稱「梵鐘」一類之器物，並不限用於寺院叢林使用，在一般民間廟宇亦屢見大鐘懸掛於廟內正殿左樑，與右樑上的大鼓相對；或有另建鐘樓，以懸掛大鐘、大鼓。

12 李建緯，〈臺中市萬和宮金屬鐘研究——試論其所反映的產銷問題〉，頁 30-67。

13 盧泰康，《文化資產中的古物研究與鑑定》，頁 302；盧泰康，〈文化資產中的火炮文物研究：以兩件臺南市藏清代古砲為例〉，王嵩山、余瓊宜主編，《微物史觀與地方社會》（臺中市：文化部文資局、逢甲大學出版，2017 年）。

14 沈括，《夢溪筆談》，引自林歡，《宋代古器物學筆記材料輯錄》（上海市：人民出版社，2013 年），頁 170。

根據筆者收集到資料，臺灣梵鐘中明確以「蓮宅」、「福省鑄人林某某」作為鑄坊落款者有 4 例，分別是宜蘭市城隍廟、臺中市萬和宮、臺南市臺灣府城隍廟、嘉義縣新港水仙宮等，按年代先後分述如下。

宜蘭市城隍廟正殿左側一方波浪形鐘口素面鐵鐘（圖 1），鐘體中央有五道凸弦紋。鐘體上方有「城隍廟」，鐘身一側鑄有「道光甲午年（道光 14 年，1834）仲秋吉旦信官蔡長青敬奉噶瑪蘭城隍廟鴻鐘一口」，文末落有「鑄人林國瑚」。值得注意的是，此件梵鐘雖未以蓮宅自稱，其鐘體造形與後文提及之萬和宮者類似，同是素面、波浪口、鐘體中央有弦文。透過造形與林姓鑄人之落款，推測應是福州蓮宅的產品。



圖 1 宜蘭城隍廟所見「鑄人林國瑚」之名，應為蓮宅鑄匠。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臺中市萬和宮文物館收藏一件梵鐘（圖 2），通高 105cm、口徑 75cm。器表通體塗上棕色漆，陽紋字銘，鐘壁淺弧口外敞，口緣呈現波浪形，鐘體中央有多道凸弦文裝飾，鐘頂為蒲牢作為懸掛之鈕。該鐘橫剖面為圓形，顯示只有單音頻。萬和宮梵鐘另一側下半部有數十公分的裂痕，可能是鐘體摔落地面造成損毀，故在日治時代以另一座銅鐘取代。關於此鐘研究，可見〈臺中市萬和宮金屬鐘研究——試論其所反映的產銷問題〉一文。¹⁵

15 李建緯，〈臺中市萬和宮金屬鐘研究——試論其所反映的產銷問題〉，頁 30-67。



圖 2 萬和宮文物館內道光年款鐵鐘，鐘面「犁頭店萬和宮、殿前大鐘一口」。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圖 3 萬和宮文物館內道光年款鐵鐘，鐘面有「道光貳拾年（1840）吉月吉日建置」、
「福省鑄人林國璉造」等字體。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該鐘表面提供了非常豐富的文獻資料，正面上方橫書「天上聖母」，兩側直書「犁頭店萬和宮」、「殿前大鐘一口」，顯示原來確實懸掛於正殿；下段右側至左側直書有年款「道光貳拾年（1840）吉月吉日建置」，並鑄有其它贊助人，分別是：

協理金春號、總理監生賴應瑞、監生何連進、監生陳玉山、監生林夢祥、鄉飲：廖涵明、楊五湖、何得意、黃象明、何仕彥、鄭光用、邱興號、致源號、和仁堂、胡添旺、劉秀恒、陳嘉忠、漳美號、杜水生、江錦盛、陳進添、陳番觀、江正順、張思智仝敬立。

最後還有祈願文「祈保合家、子孫興旺、富貴綿長、科甲蟾聯、金玉滿堂」，最重要的是，文末落有鑄造者姓名地點：「福省鑄人林國璉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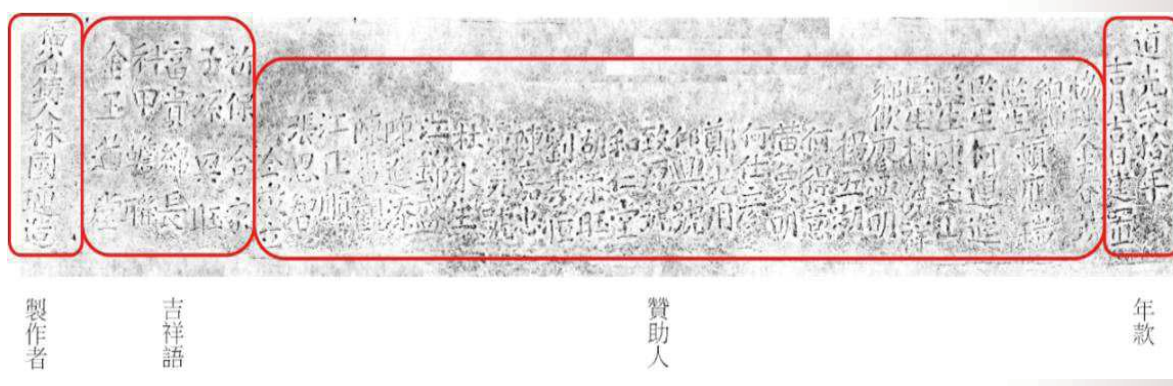


圖4 萬和宮文物館內道光年款鐵鐘拓片與銘文格式。

資料來源：引自李建緯，〈臺中市萬和宮金屬鐘研究——試論其所反映的產銷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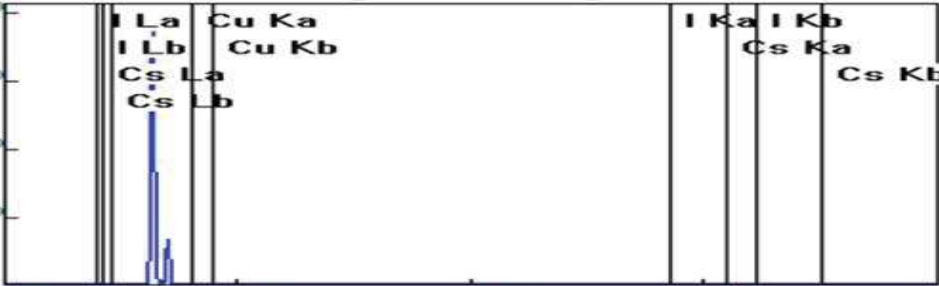
相較於臺灣其它寺廟鑄造大鐘落款的贊助人多屬文武官員、商賈、信徒或寺廟住持等，萬和宮鐵鐘卻未見任何官員的落款。其贊助者的身分有寺廟主事者，監生、地方年高德劭的信徒（鄉飲）與商號（金春號、邱興號、致源號、和仁堂、漳美號，可能是犁頭店街商號）等。上述情形顯示萬和宮道光年間鐵鐘的鑄造，多是由犁頭店街一帶民眾發起，具有濃厚的在地性格。

表 1：犁頭店萬和宮道光年款金屬鐘成分檢測

檢測點	主要元素成分 %		Fe 鐵			
	器口		100%			

Counts/s

Reading #39 18-Aug-2015




Energy keV

Peaks labeled: Fe La, Fe Lb, Cu Ka, Cu Kb, Cs La, Cs Lb, Fe Ka, Fe Kb, Cs Ka, Cs Kb

檢測點	主要元素成分 %		Fe 鐵	Zn 鋅	Pb 鉛	W 鎢
	器身		98.36%	0.39%	0.82%	0.43%

Counts/s

Reading #41 18-Aug-2015



Energy keV

Peaks labeled: Fe La, Fe Lb, Cu Ka, Cu Kb, Cs La, Cs Lb, Fe Ka, Fe Kb, Cs Ka, Cs Kb

資料來源：李建緯，〈臺中市萬和宮金屬鐘研究——試論其所反映的產銷問題〉。

透過非繞射式螢光分析儀（XRF）檢測，由於鐘體外層塗上非常厚的紅褐色保護漆，因此係從鐘體內腔未塗漆處施測。獲得成份為鐘口是純鐵 Fe（100%）；器腹則是鐵 Fe（98.36%）、鋅 Zn（0.39%）、鉛 Pb（0.82%）與

鎢 W (0.43%)，從成份上應屬銑鐵一類材質。¹⁶ 歸納上述成分數據，顯示主要成分是鐵，少量的鉛、鋅等，這些鐵以外的微量金屬元素來源，應是共用金屬熔爐之緣故。

臺南臺灣府城隍廟梵鐘一件，鐘已不存，惟存著錄。年款為「大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歲次戊申正月吉旦」，其它銘款為「合郡信官等喜捐緣金交往住持倚億赴省都鑄銅鐘一口，重捌佰伍拾觔供奉在廟永遠長鳴，福建省水關外蓮宅鑄匠林國銓」。¹⁷ 此係梵鐘首次出現「福州蓮宅」之稱。前文指出，該口鑄鐘係由地方官員捐金，交給住持，再由住持親自前往福州市督導鑄鐘，故鑄鐘生產係採訂鑄方式製作。銘文又提及福州蓮宅，明確指出其地點在福州市水關外。

無獨有偶地，嘉義新港水仙宮的素面波浪口梵鐘（圖 5），其鐘體採四段鑄接方式處理，全器以凸弦紋作為區隔。鐘上段有「嘉邑舊南港水仙尊王」陽文字體，鐘腹有上款「道光戊申廿八年（1848）十月置」、下款「溫陵眾弟子仝叩」（泉州弟子），最重要的有鑄造者訊息：「蓮宅鑄人林俊桂鑄造」。¹⁸

此鐘上下共有三條鑄接線。透過 XRF 檢測，可以發現鐘體鐵元素濃度大約介於 67%~74% 之間，而鉛含量則從 8~13.3% 之間，以及其它的鈦、銅、鉻、鋅、鋁等微量元素。¹⁹ 透過各鑄線上下不同段之鐵、鉛成份不一現象，顯示鐘體是分段鑄接，因此金屬成分比例不一。另外，由於鐘體外表有漆，因此微量元素成份多少受漆層干擾。值得注意的是，嘉義新港水仙宮梵鐘金屬鉛含量之高，遠比萬和宮鐵鐘不到 1% 高出許多，成份也與萬和宮複雜。這顯示蓮宅梵鐘的鑄造並無固定的金屬成分比。

16 本件文物成份檢測分析，採用 α 6500- 手持式 X 射線螢光分析儀（XRF），分析模式：Alloy Plus，檢測時間為 2015 年 8 月 18 日；以上工作為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史學系盧泰康教授協助檢測分析。

17 王國璠編纂，《臺灣金石木書畫略》，（臺中市：臺灣省立臺中圖書館，1976 年），頁 164-165。

18 感謝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史學系盧泰康教授提供資料，2016 年 4 月。

19 本件文物成分檢測，採用 Niton XL3t 950 GOLD+ 手持式 X 射線螢光分析儀（XRF），檢測類型為「常見金屬」，檢測日期為 2019 年 7 月 31 日，檢測人員陳遵旭。



圖 5 嘉義縣水仙宮道光戊申年款梵鐘。

資料來源：魏執宇拍攝。

表 2：嘉義新港水仙宮波浪口梵鐘成分檢測

檢測點	澆鑄孔頂		第一段鐘頂		第二段「嘉」字旁		第三段「道光」字旁		第四段鐘體正面		「水」字頭漆層	
成分比例	Fe	46.65%	Fe	67.3%	Fe	74%	Fe	68.75%	Fe	69.43%	Fe	40.17%
	Pb	23.03%	Pb	13.31%	Pb	8.03%	Pb	10.64%	Pb	8.68%	Cu	38.25%
	Ti	8.66%	Ti	6.29%	Ti	5.71%	Ti	5.85%	Ti	5.26%	Pb	6.51%
	Si	6.59%	Cu	3.61%	Cu	3.17%	Cu	5.34%	Si	4.61%	Zn	5.74%
	Cu	4.66%	Si	3.23%	Si	3.09%	Si	3%	Cu	4.12%	Si	3.9%
	Cr	3.70%	Cr	1.82%	Cr	1.62%	Cr	1.85%	Cr	3.18%	Ti	1.73%
	Al	2.92%	Zn	1.45%	Al	1.39%	Zn	1.57%	Al	1.72%	Al	1.58%
	Zn	2.04%	Al	1.25%	Co	1.18%	Al	1.33%	Zn	1.38%	Cr	1.07%
			Co	1.09%	Zn	1.17%	Co	1.29%	Co	1.21%		

資料來源：2019 年 7 月 31 日，陳遵旭檢測。

二、香爐

除了梵鐘，傳世文物中也見落有「蓮宅」的香爐，實物見金門南門境天后宮銑鐵鼎式爐。該見香爐爐身正中央一盤龍紋，龍紋上方鑄有「天上聖母」四字；爐身一側有「道光丁未年」（1847），另一側則鑄有「蓮宅鑄匠林國蒲」（圖6）。透過未上漆的露胎判斷，此件為鐵質。雙耳從爐身兩側上折呈現朝冠樣式，惟爐耳中央有長方形孔。



圖6 金門南門境天后宮道光丁未年款（1847）銑鐵鼎式香爐。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2019年10月。

金門南門境天后宮的鼎式香爐，和臺灣其它鼎式香爐造形明顯不同。臺南孔廟 2 件鼎式銅爐，器表署有「乾隆四十一年（1776）臺灣知府蔣元樞捐造貢生蔣鳴皋監製」年款；²⁰ 臺南大天后宮供桌上同樣有蔣元樞捐造鼎式銅爐（圖 7）。²¹ 上述 3 件銅爐皆是蔣元樞委託蘇州鑄銅工匠所作。²² 臺南天壇正殿供桌上，也有一件造形和蔣元樞方鼎極為相似的銅鼎（圖 8），其背景底紋的雷紋更細密，惟足部採用柱足而非扁足。後者應是臺南天壇建廟時向大陸訂製，其年代或為建廟的咸豐 5 年（1855）。²³



圖 7 臺南大天后宮蔣元樞捐造鼎式銅爐，乾隆。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圖 8 臺南首壇天公廟所見鼎式銅爐。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2015 年 1 月。

銑鐵爐則以新港奉天宮道光年款四足鼎式銑鐵爐（圖 9）為代表。此爐上款陽刻「道光甲辰年」（道光 24 年，1844）字樣，下款有「新南港吉旦」

20 黃翠梅、李建緯，《俎豆千古·禮陶樂淑》（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史學系，2011 年），頁 47-66。

21 李建緯，〈臺南大天后宮早期金屬香爐年代與形制源流考〉，彭文宇主編，《媽祖文化研究論叢（I）》（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 5 月），頁 209。

22 黃翠梅、李建緯，《俎豆千古·禮陶樂淑》，頁 92。

23 吳培暉、曾國棟著，《臺灣首廟天壇寺廟生命史》（臺南市：臺灣首廟天壇，2004 年），頁 44。

字樣。雙側為獅面淺浮雕，下有獅吞腳造形四足，獅首與獅爪形象真實。正、反面圖文相同。四足與展耳為鑄好後再與爐身接鑄，爐腹底部有澆鑄孔，顯示此鐵爐為倒立澆注製造而成。爐耳與前述銅爐都是從口緣向上延伸，與金門南門境天后宮的銑鐵鼎式香爐爐耳型態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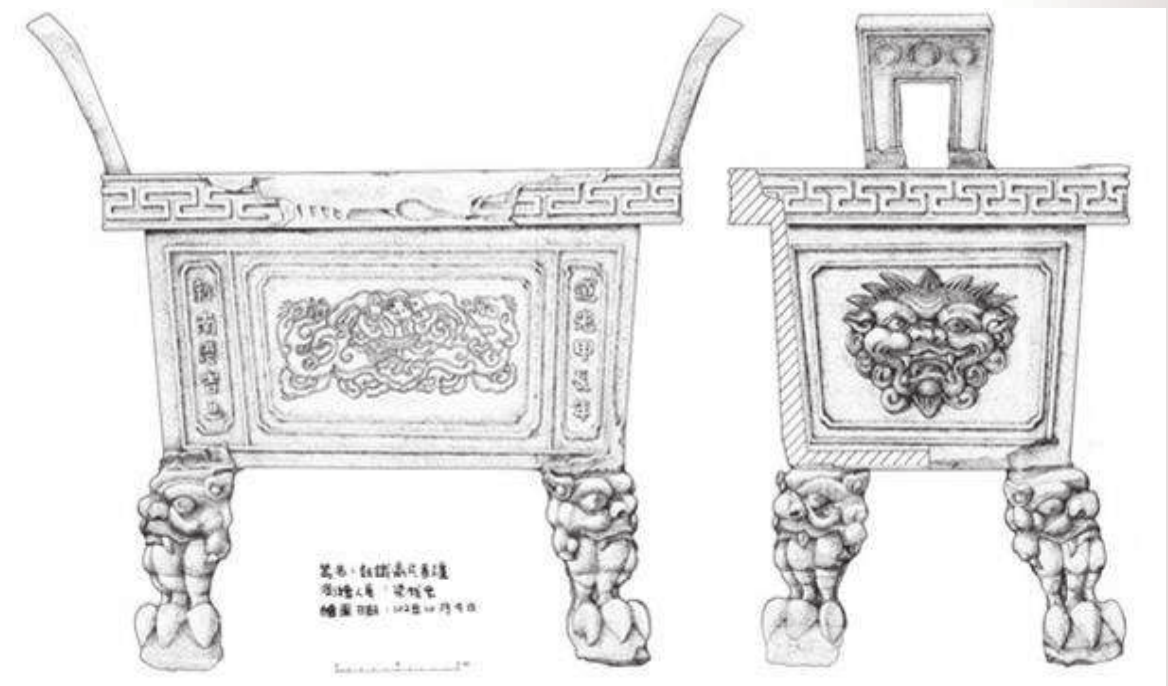


圖 9 嘉義新港奉天宮銑鐵香爐線繪圖。

資料來源：梁雅雲測繪。



圖 10 臺南縣城隍廟的鼎式銑鐵爐。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位於臺南縣城隍廟的鼎式銑鐵爐（圖 10），爐身正面鑄有「縣城隍爺」；一側有「咸豐己未年梅月吉置敬謝」；另一側則有「弟子王吉利蔡紹田仝叩奉 督造僧達源 霞漳合茂炉造」，顯示這種爐耳從口緣延伸出來的銑鐵方爐，其中一種來自於漳州店號「合茂」所製。上述現象反映著器形不同代表來自不同鑄坊的可能。

另外，前文指出擁有蓮宅鑄造梵鐘的嘉義新港水仙宮，宮內另一件道光 28 年（1848）銑鐵方爐（圖 11），爐身正面為「水僊宮」，上款「道光戊申十月」、下款「溫陵眾弟子仝叩」，推測可能是蓮宅作品。理由如下：其一、廟方牆上嵌有一方道光庚戌年款（道光 30 年，1850 年）烏金石上鐫刻的「重修水仙宮碑記」，碑文內容主是記載道光 28 年笨港水仙宮重修後，捐獻人員、項目與費用之物賬，其中一條提到「開鑄鐘併香炉去銀貳拾肆元捌角伍占捌格」（圖 12）；換言之，落有蓮宅鑄款的鐘，與該件鐵爐係同時製作，如此便有理由推測該爐也是委託蓮宅鑄造。其二、奉獻人同樣是「溫陵眾弟子仝叩」，因此前往委託督造者出於方便，不會分開兩地另外訂製。其三、該爐與金門南門境天后宮落有蓮宅款銑鐵方爐造形幾無二致，同樣是爐身兩側折耳向上延伸。由此來看，該件銑鐵爐不排除也是蓮宅作品。



圖 11 嘉義新港水仙宮道光 28 年銑鐵爐。

資料來源：魏執宇拍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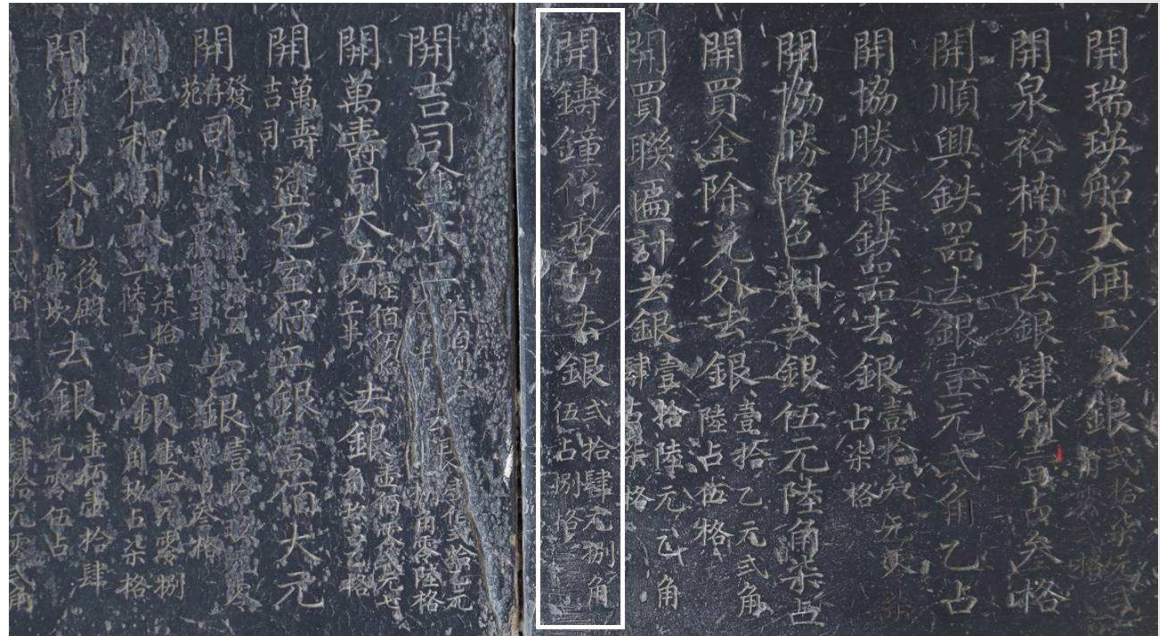


圖 12 嘉義新港水仙宮道光庚戌年款烏金石碑。

資料來源：魏執宇拍攝。

此爐透過 XRF 檢測，可以發現爐身鐵濃度大約介於 74%、爐耳為 81%；至於爐身鉛含量則為 7.17% 左右，以及其它鋁、矽等元素。²⁴ 整體來說，香爐中鐵的成分比例大約是 7 成半到 8 成左右，比起新港水仙宮梵鐘約七成還高。

表 3：嘉義新港水仙宮道光年款鐵爐成分檢測

檢測點	成分比例						
	Fe	Si	Pb	S	Al	Cr	Co
外圍「僊」字下方爐身	74%	7.85%	7.17%	4.17%	2.45%	1.24%	1.11%
左側爐耳頂	Fe	Si	Al		S		
	81.15%	11.92%	3.23%		1.91%		

24 本件文物成分檢測，採用 Niton XL3t 950 GOLD+ 手持式 X 射線螢光分析儀（XRF），檢測類型為「常見金屬」，檢測日期為 2019 年 7 月 31 日，檢測人員陳遵旭。

透過前文的比對，若爐身兩側延伸出折耳是蓮宅鑄爐之特點，那麼可以反推，嘉義朴子配天宮一件己未年款（1859 或 1919 年）的銑鐵爐（圖 13，爐身正面鑄有「配天宮天上聖母」、一側為「己未年四月置」；另一側為「眾信士仝叩」），從器型、落款方式判斷，可能也是蓮宅的鑄器，或說具蓮宅風格之銑鐵香爐。



圖 13 嘉義朴子配天宮己未年款銑鐵方爐。

資料來源：李建緯拍攝。

三、火炮

蓮宅落款火炮，臺灣所見實例頗為豐富。盧泰康《文化資產中的古物研究與鑑定——臺南瑰寶大揭密》指出，蓮宅林氏家族落款火炮有 5 門，分別是位於基隆的艋舺營 1 門、位於臺南成功大學的嘉義營 1 門、以及位於澎湖的臺協三營火炮 3 門。²⁵

²⁵ 盧泰康，《文化資產中的古物研究與鑑定——臺南瑰寶大揭密》（臺北市：五南圖書，2017 年 7 月），頁 297-302。



圖 14 新北市淡水古蹟博物館道光 30 年（1850）匠首林茂周鑄造火砲。
資料來源：盧泰康提供。

新北市淡水古蹟博物館內藏有道光 30 年（1850）由匠首林茂周所鑄造的火砲（圖 14），砲長 128 公分，有砲尾環，砲身鑄有「道光三十年（1850）奉 憲鑄造艋舺營 大礮一位重伍百觔 匠首林茂周」。此火砲過去最早的調查見於楊仁江《臺灣地區現存古礮之調查研究》。²⁶

此外，成大校區內保存一門砲尾環遺失的火砲（圖 15），砲長 163.5 公分，砲身鑄有「同治十二（1873）年 奉憲鑄造嘉義營 大砲鐘壹千觔 匠首林俊雄、林國琉」、「配藥□十兩 配子□十兩」。根據盧泰康研究，此砲為 1975 年出土於高雄岡山原日治時代的「岡山工場」，估計是由嘉義運至該地，準備融化做為日軍武器，其後因故而被保存下來。²⁷ 其中的林俊雄，筆者根據其它傳世火砲落款判斷，不排除也可能是「後」；海外梵鐘也多有發現有「後」字輩。



圖 15 成大校區林俊雄、林國琉等人鑄造同治 12 年款（1873）火砲。
資料來源：盧泰康提供。

26 楊仁江，《臺灣地區現存古礮之調查研究》（內政部委託，1991 年），頁 262-264、429-432、548-552。

27 盧泰康，《文化資產中的古物研究與鑑定》，頁 297-300。

澎湖有三門與蓮宅有關火砲，第一門位於縣立文化中心（圖 16），砲長 201.5 公分，砲身銘文為「光緒二年（1876）奉 憲鑄造臺協三營 大砲重壹千伍百觔 匠首林茂昇副將首林國琉」；第二門火砲（圖 17）尺寸與造形與第一門相似，砲身同樣鑄有「光緒二年 奉 憲鑄造臺協三營 大砲重貳千觔 匠首林茂昇副匠首林國琉」，惟部分字跡因生鏽而剝落。²⁸

另外，目前基隆和平島公園內保存鐵砲一門（圖 18），係於 1984 年在澎湖馬公港測天島水域所打撈出水。砲身銘文為「光緒二年奉憲鑄造臺協三營大砲重捌百觔匠首林茂昇副匠首林國琉」，²⁹ 與前述澎湖另兩門火砲鑄款相同。上述三門澎湖發現的火砲，應是屬於清廷派駐安平水師協中、左、右三營所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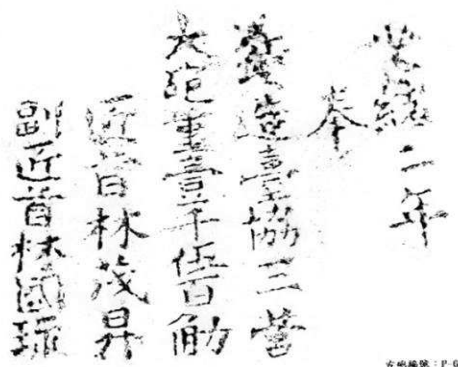


圖 16 澎湖縣文化局藏光緒 2 年（1876）壹千伍百觔火砲，匠首林茂昇、副匠首林國琉。
資料來源：盧泰康提供。



圖 17 澎湖縣文化局藏光緒 2 年（1876）貳千觔火砲，匠首林茂昇、副匠首林國琉。
資料來源：盧泰康提供。

28 盧泰康，《文化資產中的古物研究與鑑定——臺南瑰寶大揭密》，頁 301-302。

29 楊仁江，《臺灣地區現存古砲之調查研究》（內政部委託，1991 年），頁 262-264、429-432、548-552。



圖 18 基隆和平島公園光緒 2 年（1876）火砲、匠首林茂昇、副匠首林國琉。
資料來源：盧泰康提供。

除了前述臺灣發現的 5 門火砲，筆者在廈門博物館館外陳列的數座火砲中，發現其中數座（圖 19）也是由福州林氏家族所鑄。過去《福建文博》已發表有 3 座火砲，皆是 1994 年 7 月廈門舊城遺址出土，有咸豐 2 年（1852）2 座，鑄銘為「咸豐二年奉閩浙總督部堂□福建巡撫部院王鑄造大砲重一千斤」、「配藥四石子六十兩匠首林□□」；另一座則為同治 8 年（1869），砲體鑄有「同治八年夏 奉 憲鑄造水提前營大砲一位 重一千觔匠首林後祺」，砲尾環有「配藥四子六十兩」。³⁰ 該座火砲與成大校區火砲年代、寫法相似，顯示蓮宅火砲可能提供了中國東南沿海各營防衛上的需要，並不限於臺灣使用。

中國原來火砲的砲耳大多位於砲身中軸線上，至於西洋型制火砲砲耳則低於砲軸中線，因此蓮宅這類火砲與過去傳統中式火砲不同，係模仿西洋「阿姆斯特壯樣式」前膛砲，砲身、砲尾與砲尾環等特徵。根據盧泰康的研究，1840 年代鴉片戰爭中臺灣清代軍隊至少擄得 20 餘門西洋艦砲，這些阿姆斯特壯樣式西洋火砲除了被納入了臺灣軍事防衛武器外，甚至中國本土也開始仿鑄西洋鐵砲。³¹ 本文討論的林氏匠首等火砲便是如此。

從前文來看，不論是萬和宮、臺灣府城隍廟銍鐵鐘，金門南門境天后宮的鐵爐，器表上的「蓮宅鑄人林國某」，皆屬福州鑄匠，落款都在道光年間，

30 鄭東，〈廈門近年出土古砲及明清民海防設施考述〉，《福建文博》（1999 年第 2 期），頁 75。

31 盧泰康，《文化資產中的古物研究與鑑定——臺南瑰寶大揭密》，頁 307。

且皆以「林、國」作為姓名前二字，推測應是福州蓮宅同一家族的鑄匠。至於火炮上匠首林某某，也應屬蓮宅林氏家族。



圖 19 廈門博物館藏蓮宅林氏家族鑄咸豐 2 年（1852）與同治八年款（1869）火炮。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叁、海外關於蓮宅文物

福州蓮宅鐵器銷售地點，並不限於臺灣本地。透過法國學者蘇爾夢（Claudine Salmon）在南洋收集到材料可知，蓮宅製品年代從最早的印尼梭梹鎮國寺的 1821 年，到最晚的福州正心堂 1931 年，延續約 110 年，共採集到 26 例。該研究指出：

根據福州林則徐紀念館館長關桂銖言，蓮宅鑄坊未存留文字資料。根據筆者曾偕關館長考察原址。蓮宅位於福州城西南的水部門（水關），有一小運河通閩江，鑄坊藉其運輸原料產品。蓮宅鑄坊均於上世紀 50 年代關閉，原址變民居，住戶為諸坊主後裔，皆林姓。西元 2001 年，筆者訪是地，恰遇一昔年鑄匠，據言，其先祖原籍南京，明末遷榕，清嘉慶年間（西元 1796 年至西元 1820 年）始建鑄坊，生產鑄鐘，鑄像，祭皿。如同佛山鑄坊，蓮宅亦一度鑄造武器，尤其鐵炮。林則徐紀念館存有三門蓮宅鐵炮，一鑄於西元 1842 年，餘皆鑄於西元 1852 年。鐵礦來源未考。鑄坊為家庭產業，其中八或九家堅持至 50 年代方歇業。福州周圍寺廟，仍可見蓮宅梵鐘，有鑄於 19 世紀 70 年代，亦有鑄於 20 世紀 2、30 年代。據說，有蓮宅林姓鑄工，赴港為胡文虎兄弟之虎豹園鑄鐘（筆者訪港，恰虎豹園關門，未能考實）。依所存蓮宅梵鐘判斷，印尼當為其產品之最佳銷處。中爪哇梭羅一寺廟裡曾懸有一鐘，鑄於西元 1821 年，銘文未載鑄坊行號，然據形態推斷，似為蓮宅產品。若然，該鐘則為最早蓮宅鑄鐘。可惜，去年筆者重詣該寺，此鐘已竊失。蘇島靠近棉蘭的民禮市有一寺，內有一鐘，鑄於西元 1893 年，銘文曰：「福州蓮宅鑄匠林後銀造」，此係已知最早刻有蓮宅林姓作坊行號的鑄鐘。最晚近的印尼蓮宅梵鐘，鑄於西元一九二七年，現存棉蘭一寺廟。³²

蘇爾夢關於蓮宅位「福州城西南的水部門（水關）」之說，恰可為臺灣府城隍廟鐘所見鑄銘「福建省水關外蓮宅鑄匠林國銓」印證。不過，其提及福州城西南之說實際上鼓樓區蓮宅應位於福州城東南方；再者，研究指出「鑄坊為家庭產業」應修正為家族產業，或是同姓匠幫。誠如本文提到，臺灣蓮宅鑄鐘多屬道光年間製品，與她在東南亞所發現蓮宅梵鐘落在整個 19 世紀到 20 世紀初，更加集中在特定 19 世紀前半。綜合蘇爾夢的研究，筆者已撰文指出蓮宅梵鐘產銷地點不只南洋，臺灣也在其產銷範圍內（圖 20）。³³

32 Claudine Salmon 著，〈從梵鐘銘文看中國與東南亞的貿易往來〉，頁 24-25。

33 李建緯，〈臺中市萬和宮金屬鐘研究——試論其所反映的產銷問題〉，頁 30-67。

根據陳荊和、陳育崧編《新加坡華文碑銘集錄》（1972）、³⁴ 傅吾康編《泰國華人銘刻萃編》³⁵、《馬來西亞華文銘刻萃編》³⁶ 與《印尼華文銘刻彙編》³⁷ 等南洋華文刻銘資料，可以發現不少蓮宅落款的梵鐘。其他未落款之梵鐘，也有不少造形與蓮宅相近者，惟本文主要提出其中有明確落款者，作為分析。



圖 20 福州蓮宅梵鐘貿易地點。

資料來源：筆者根據 Claudine Salmon〈從梵鐘銘文看中國與東南亞的貿易往來〉頁 26 地圖 4 改繪。

34 陳荊和、陳育崧編，《新加坡華文碑銘集錄》（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72 年）。

35 傅吾康編，《泰國華人銘刻萃編》（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9 年）。

36 傅吾康、陳鐵凡編，《馬來西亞華文銘刻萃編》（吉隆坡：馬來亞大學出版社，1985 年）。

37 傅吾康編，《印尼華文銘刻彙編》（新加坡南洋學會、巴黎法國遠東學院和巴黎群島學會，1997 年）。

印尼有福州蓮宅落款者，實例甚多，印尼亞齊（Ache）的司馬威（Lhokseumawe）的廣福堂內波浪口梵鐘一口（圖 21），鐘身有銘文：「沉香廣福堂」，年款「宣統叁年（1911）歲次辛亥仲春仝敬啟」、鑄造者「蓮宅鑄匠林後官造」。³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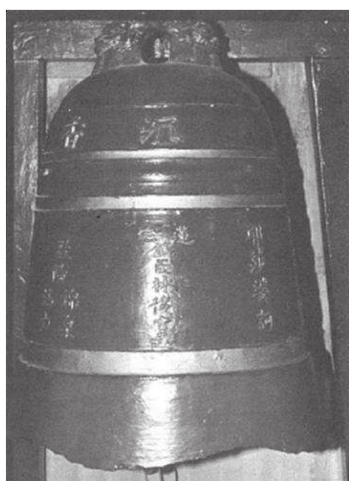


圖 21 印尼亞齊司馬威廣福堂宣統叁年款（1911）梵鐘。

資料來源：蓮宅林後官造，傅吾康編，《印尼華文銘刻彙編》vol.1，頁 78。



圖 22 印尼北蘇門答臘棉蘭關帝廟民國丁卯年款（1927）梵鐘。

資料來源：林常根鑄造，傅吾康編，《印尼華文銘刻彙編》vol.1，頁 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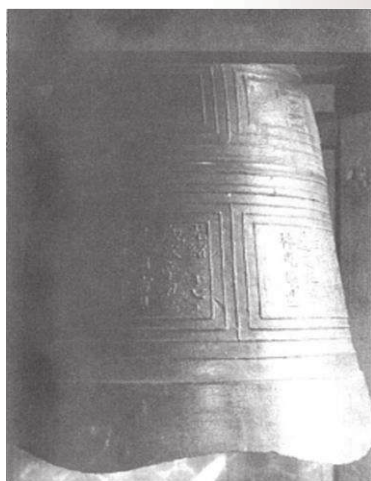


圖 23 印尼棉蘭壽山宮光緒二十七年款（1901）梵鐘。

資料來源：鑄匠福建省閩邑水部門外蓮宅地方林光煥，傅吾康編，《印尼華文銘刻彙編》vol.1，頁 100。

印尼北蘇門答臘（North Sumatra）棉蘭（Madan）關帝廟，廟內波浪口梵鐘一口（圖 22），鐘體飾以弦紋和方型開光，開框內有淺浮雕之坐佛圖像。鐘體鑄有銘文：名稱「水火山天壽宮」、「佛曰增輝法輪常轉」、「棉蘭李勝發敬送」、年款「民國丁卯年（1927）臘月吉旦立」、「住福州下甲林常根鑄造」。棉蘭壽山宮同樣一口梵鐘（圖 23），鐘體以弦紋與袈裟方格紋作為區隔，鐘體鑄有銘文：名稱「壽山宮」、祈願文「…度眾生」、年款「光

38 傅吾康編，《印尼華文銘刻彙編》vol.1，頁 78。

緒二十七年（1901）歲次辛丑十二月即日吉旦立」、鑄造者「鑄匠福建省閩邑水部門外蓮宅地方林光煥造」。³⁹

印尼北蘇門答臘（North Sumatra）民禮（Binjai）鎮元宮，波浪口梵鐘（圖 24），鐘體以弦文作為上下區隔，鐘體銘文：名稱「鎮元宮」、年款「光緒癸巳年（1893）良月吉旦立」、捐獻者「福建弟子莊哲兔、顏敬仲、潘柔明、石清主、林資買仝重建」、以及鑄造者「福州鑄匠迨宅林後銀造」。⁴⁰ 福州迨宅雖非署蓮宅地方，但林後銀與蓮宅另一位鑄匠林後官都屬後字輩，不排除也是林氏家族。

印尼北蘇門答臘（North Sumatra）丹戎浮拉（TanjungPura）的鳳田宮，波浪口梵鐘（圖 25），鐘體以弦文作為上下區隔，鐘體銘文：主祀神明「廣澤尊王」、年款「大清光緒二十一年（1893）歲次乙未孟春之月吉旦」、捐獻者「福建省漳州府海澄縣沐恩弟子蔡元在 李甘足敬奉」、鑄造者「鑄匠住水部外連（蓮）宅 林□泉造」。⁴¹

印尼楠榜（Nampung）直落勿洞（TelukBetung）大興廟，波浪口梵鐘（圖 26），鐘體以弦紋與方格袈裟紋為區隔，鐘體鑄有銘文：祈願文「皇國永固 帝道遐昌 佛日增輝 法輪常轉……」、年款「光緒戊戌四月保（1898）……」、鑄造者「鑄鐘匠關張福建福州府閩邑水部門外蓮宅地方林光□造」。⁴² 由於此件梵鐘與印尼棉蘭壽山宮的造型極為相似，工匠落款又是林光某，推測可能就是林光煥或其家族同輩。

39 傅吾康編，《印尼華文銘刻彙編》vol.1，頁 86、100。

40 傅吾康編，《印尼華文銘刻彙編》vol.1，頁 170。

41 傅吾康編，《印尼華文銘刻彙編》vol.1，頁 282。

42 傅吾康編，《印尼華文銘刻彙編》vol.1，頁 560。



圖 24 印尼北蘇門答臘民禮鎮元宮光緒癸巳年（1893）款。

資料來源：福州鑄匠迺宅林後銀造，傳吾康編，《印尼華文銘刻彙編》vol.1，頁 170。



圖 25 印尼北蘇門答臘丹戎浮拉鳳田宮光緒二十一年（1893）款。

資料來源：連（蓮）宅林□泉造，傳吾康編，《印尼華文銘刻彙編》vol.1，頁 2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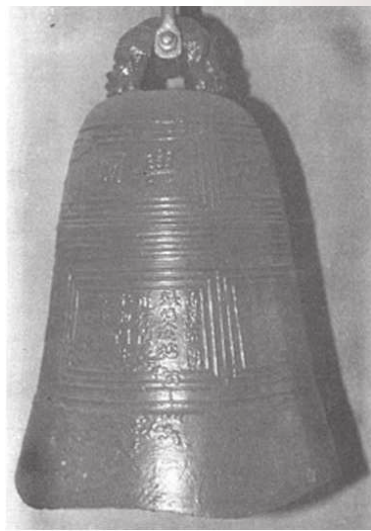


圖 26 印尼楠榜直落勿洞大興廟光緒戊戌年款（1898）梵鐘。

資料來源：蓮宅林光□造，傳吾康編，《印尼華文銘刻彙編》vol.1，頁 560。

印尼中爪哇（Central Java）三寶壠（Semarang）三寶大覺寺的波浪口梵鐘（圖 27），鐘體以弦紋與方格袈裟紋為區隔，鐘體最上方鑄有銘文「三寶壠大覺寺」、祈願文「願此鐘聲超法界，鐵圍幽暗悉接聞。願塵清淨證圓通，一切眾生成正覺。如人欲了知三界，一切佛應觀法界。唯一切，惟心造。南無大方廣佛嚴經，華嚴海會佛菩薩，唵伽嚩帝耶娑婆訶，皇圖永固，帝道遐昌，佛日增輝，法輪常轉」、年款「光緒戊戌年（1898）四月佛誕鑄」、捐獻者「海澄信士顏功禮敬獻合家平安」、鑄造者「鑄鐘匠主福建福州閩邑水關外蓮宅林光煥造」。⁴³

43 傳吾康編，《印尼華文銘刻彙編》vol.2，頁 373。



圖 27 印尼中爪哇三寶瓏大覺寺。

資料來源：光緒戊戌年（1898）林光煥造，
傳吾康編，《印尼華文銘刻彙
編》vol.2，頁 373。



圖 28 印尼中爪哇直葛澤海宮。

資料來源：光緒乙未年（1895）林光煥造，
傳吾康編，《印尼華文銘刻彙
編》vol.2，頁 593。

印尼中爪哇（Nampung）直葛（Tegal）澤海宮的波浪口梵鐘（圖 28），鐘體以弦紋為區隔，鐘體最上方鑄有銘文「澤海宮神鐘」、祈願文「願此鐘聲超法界，鐵圍幽暗悉接聞。願塵清淨證圓通，一切眾生成正覺。聞鐘聲，煩惱輕，離地獄，出火坑，知慧長，菩提生」、年款「光緒乙未年（1895）四月八日吉旦」、捐獻者「董事甲必丹許高泰暨合波人弟敬立」、鑄造者「匠人福建省水關外蓮宅地方林光煥造」。⁴⁴

關於馬來西亞，在檳城（Penang）亞依淡（Ayer Itam）鶴山極樂禪寺一口波浪口梵鐘（圖 29），過去抄錄資料錯誤頗多。⁴⁵ 根據筆者於 2019 年 8 月 24 日現勘（圖 30），⁴⁶ 落款應為鐘體銘文鐘頂有「極樂禪寺」，側身有「大

44 傳吾康編，《印尼華文銘刻彙編》vol.2，頁 593。

45 傳吾康、陳鐵凡編，《馬來西亞華文銘刻萃編》vol.2，頁 968。

46 2019 年 8 月 24 日由檳城古蹟信託會林玉裳主席帶領前往踏查。

清光緒庚子年冬月大英一千九百年十一月吉旦」，祈願文「皇圖鞏固、帝道遐昌、佛日增輝、法輪常轉」；捐獻者「鼓山湧泉禪寺方丈創建極樂寺開山住持妙蓮得如□監院真慧志泉本忠 善慶西根法見副寺月鏡仝募」，以及鑄造者「鑄匠人蓮宅林後琰（或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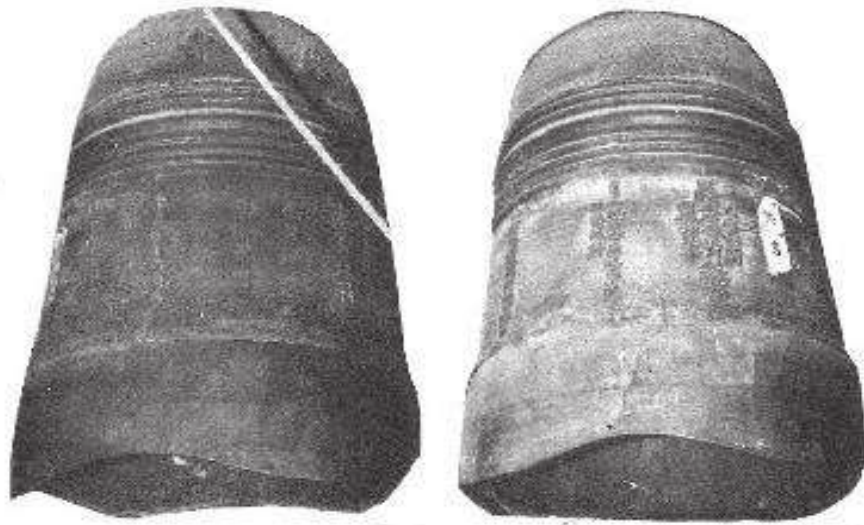


圖 29 馬來西亞檳城（Penang）亞依淡（Ayer Itam）極樂禪寺。光緒庚子年（1900）。



圖 30 檳城（Penang）極樂禪寺。光緒庚子年（1900）林後琰（或琰？）鑄造梵鐘。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同樣位於檳城（Penang）喬治市亞依淡（Ayer Itam）鳳山天公壇長慶殿，主體建築建於光緒乙巳年（1905）。發現過去未曾被記錄的蓮宅鑄人鑄造宣統元年（1909）梵鐘 2 座（圖 31、32）。鐘頂有「鳳山天公壇長慶殿」，側身有「宣統元年吉立」，祈願文「皇圖鞏固、帝道遐昌、佛日增輝、法輪常轉」；捐獻者同樣是「信女謝素皈答謝住持鏡明募造」，鑄造者都是「鑄匠主蓮宅林後珠鑄」。另外，檳城頂日落洞由福建公司建於清光緒 12 年（1886，有木香爐的丙戌年款）的清龍宮，同樣懸掛一座光緒 14 年（1888）款的蓮宅梵鐘（圖 33），鑄人則是林後往（「往」字模糊，也可能是桂或住？）造。⁴⁷



圖 31 馬來西亞檳城（Penang）亞依淡（Ayer Itam）鳳山天公壇長慶殿，宣統元年（1910）林後珠鑄造梵鐘。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圖 32 馬來西亞檳城（Penang）亞依淡（Ayer Itam）鳳山天公壇長慶殿，宣統元年（1910）林後珠鑄造。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圖 33 馬來西亞檳城（Penang）頂日落洞清寶殿清龍宮，清光緒十四年（1888）林後往鑄造梵鐘。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就檳城梵鐘鑄器產地分析，營建寺廟匠人不論是在神像製作或是寺廟風格，受雇於寺院倡建者或僧人，其文化網絡因素讓他們自然而然的傾向於購置當時在福建已經饒富盛名的福州蓮宅生產的鑄器。如鶴山極樂禪寺係由福州湧泉寺方丈妙蓮所創建，他原受邀主持檳城廣福宮，其後因禪修於鶴山創

47 2019 年 8 月 24、26 日檳城古蹟信託會林玉裳主席帶領前往踏查。

建極樂寺；⁴⁸ 天公壇長慶殿入口大門上方懸挂「人千天一」木匾，落有「光緒三十一年乙己創建，廣福宮信理部敬立，1954年甲午重建」之款，顯示光緒31年（1905）當時管理成員是廣福宮（椰腳街觀音亭），其事務則由廣福宮內僧眾等福建幫所主持。



圖 34 馬來西亞麻六甲青雲亭，宣統3年款蓮宅風格梵鐘，無蓮宅鑄匠落款。
資料來源：林玉裳提供。

此外，麻六甲最大華人寺廟的青雲亭，廟內一方碑文指出是由馬六甲首任華人甲必丹鄭芳揚於明萬曆28年（1600）所建。今日廟貌則是嘉慶6年（1801）另一名華人甲必丹蔡士章擴充。青雲亭內有一件懸掛梵鐘，是由漳籍人士也是擔任青雲亭亭主的薛佛記捐造之道光12年（1832）款西洋銅鐘，其上方標示有「Petit et Fritsen me fuderunt」，其中的「Petit et Fritsen」是荷蘭的工房名稱。⁴⁹ 不過，除了該鐘，透過檳城古蹟信託會主席林玉裳提供的訊息，青雲亭懸掛有一蓮宅風格的梵鐘（圖34）。鐘體表面鑄有「麻六甲青雲亭住持僧轉伏敬贈」、「宣統三年（1912）歲次辛亥荔月下浣吉置」，顯示這件梵鐘是大清帝國最後一年的年號所鑄。

48 李興前主編，《檳城鶴山極樂寺》（檳城：檳城極樂寺，2003年），頁14。

49 有關該作坊的資料，詳見網址 <http://www.petit-fritsen.nl/en/geschiedenis.php>，2019年9月30日點閱。Petit et Fritsen me fuderunt 全文意思是由「Petit et Fritsen 工房鑄造」。有趣的是，1824年英荷條約中，馬六甲已被割讓給英國，但薛佛記在1832年時仍向荷蘭作坊訂製銅鐘，而且還落中文款。



圖 35 馬來西亞麻六甲廣福宮，宣統 3 年款蓮宅風格梵鐘，無蓮宅鑄匠落款。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另外，位於麻六甲機場街轉角的廣福宮，透過門額（光緒乙巳年，1905）、石獅（光緒丙午年，1906）、匾額（光緒甲辰年，1904）可知，廟體約建於光緒年間，主祀廣澤尊王。廟內懸有一鐘（圖 35），雖無法直接窺見製作年代與鑄匠名稱，但透過鐘體樣式判斷屬蓮宅風格。其年代應與本廟建造時間相近，也大約是 1904~1906 年之間。透過麻六甲的兩件梵鐘可知，並非所有蓮宅梵鐘皆有鑄匠落款。

透過筆者收集蓮宅林氏家族落款梵鐘分析，其分布範圍主要是西馬來西亞西岸的麻六甲、檳城等華人寺廟，以及印尼蘇門答臘東岸、中爪哇島北岸華人寺廟。透過南宋趙汝適的《諸蕃志》⁵⁰、元汪大淵的《島夷志略》⁵¹ 可知，宋元時期福建海商已開闢從泉州到菲律賓群島、婆羅洲地區的南洋貿易航線；其中《諸蕃志》指出宋代泉州到東南亞渤泥國（今日汶萊）有兩條航線，一條是東南航線、一條是西南航線；⁵² 再根據明萬曆年間張燮的《東西洋考》⁵³，顯示至少在明代晚期華人下南洋航線已形成「東洋針路」與「西洋針路」兩條路線。該兩條路線的形成與洋流、風向以及沿途的港口有關。東洋針路包括中國、菲律賓、婆羅洲、琉球、日本等路線；西洋針路則是婆羅洲以西到印度、波斯、阿拉伯等

50 〔宋〕趙汝適，馮承鈞校注，《諸蕃志校注》（上海：商務印書館，1940 年）。

51 〔元〕汪大淵，《島夷志略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81 年）。

52 聶德寧、張元，《牽星過洋——福建與東南亞》（海峽出版發行集團、福建教育出版社，2018 年），頁 25-31。

53 〔明〕張燮，《西洋朝貢典錄校注·東西洋考》（北京：中華書局，2000 年），頁 171-185。



圖 36 明代月港東西洋航線主要港口示意圖，透過此圖可以發現海上航線分成東洋針路與西洋針路，其中的蓮宅梵鐘，多分布在西洋針路。此圖筆者補入檳城。資料來源：引自《龍海縣志》頁 405。

路線。馬來西亞西岸的檳城、麻六甲，蘇門答臘中部、北部所發現的蓮宅梵鐘，以及爪哇島、蘇門答臘南部班達楠榜等地蓮宅梵鐘主要屬於西洋針路。如此可以反思，蘇爾夢所繪製航海路線在東馬、西馬中央岔開，實際上與華人海上貿易停泊諸港路線未必完全相符，雖然當時華人下南洋的方式有輪船與帆船之選擇。⁵⁴ 更可能的航路是帆船沿著東南半島幾處大港、島嶼周圍航行，或可參考《龍海縣志》所繪明月港東西洋航線、主要港口示意圖的航海路徑（圖 36），⁵⁵ 否則會有水源食物補及不足之問題。

值得注意的是，蓮宅梵鐘並未外銷到泰國。筆者於曼谷華人寺廟所見梵鐘全來自佛山，顯示廣東佛山鑄鐘分布範圍比蓮宅廣，也證明就海外華人金屬鑄鐘訂製產地而言，廣東佛山仍是首選。

肆、對福州蓮宅鑄器的再認識

福州市鑄造工藝啟蒙的很早，一說是唐代福州已設有鑄錢監，鑄造有「福」字為背文的銅錢。而前文提及宋代以前的福州開元寺大鐵佛，高 5.3 公尺、寬 4 公尺；其後，清順治 4 年（1647）福州鼓山湧泉寺也發現 3 尊大型鑄佛，每尊重 16.5 噸；以及一口康熙 35 年款（1696）之梵鐘，重可達 2,000 公斤，其上布滿金剛經文，證明了福州在清初已有鑄造大型梵鐘的技術。

西方列強的入侵，尤其是道光 20 年（1840）爆發的鴉片戰爭，對於福州鑄造工業發生極大的影響。鴉片戰爭結束後，根據 1842 年中英簽定《南京條約》，沿海開放通商口岸，分別設在廣州、廈門、福州、寧波和上海 5

54 根據 1914 年 8 月 10 日新加坡《南洋總匯報》指出，1884 年當年從中國華南各港口移民至新加坡達 11 萬人，其中搭乘輪船者 283 艘、帆船者 56 艘。這反映出 1880 年代起中國移民下南洋的交通方式已經是以輪船為主，原因是蒸氣輪船業的興起，航海技術上的進步促成更大的南洋移民潮的形成。薛莉清〈航向南洋——旅行者南洋空間的丈量〉，《晚清民初南洋華人的文化建構：一種文化空間的發展》（北京：生活 讀書 新知 三聯書店，2015 年），頁 121。

55 黃建嵐主編，《龍海縣志》（北京：東方出版社，1993 年），頁 405。

個城市，此即「五口通商」。根據條約，道光 25 年（1845）英商便在通商口岸之一的福州馬尾，設立福州造船公司，當時雇用中國工人修造輪船與拖船。⁵⁶

清廷受到鴉片戰爭的衝擊，於是朝廷有識之士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官方啟動邁開西化腳步、學習西洋官堅砲利的技術：同治 5 年（1866）於福州市馬尾創辦福建船政局，同治 7 年（1868）首艘軍商兩用船「萬年青」開始建造，隔年下水。直到光緒 33 年（1907）福建船政局停辦，其間共建造了船艦 40 艘，佔當時中國自製船艦產量的 70%。⁵⁷除了船艦，同治 7 年在福州水部門也創辦了福州機械局，專門製造子彈和火藥；光緒元年（1875）福州洪山橋開辦福州機械製造局；光緒 8 年（1882）又在福州機械製造局內設立槍炮廠。⁵⁸

私人作坊方面，福州鑄造集中在洋中路鑄鼎環一帶，因而有「鑄鼎街」之名，鑄匠以王姓為主。至於蓮宅與水部一帶，文獻指出民國 8 年（1919）到 11 年（1922）間，設立有製造工廠與作坊。直到解放軍於民國 38 年解放福州市時，當時福州私營機械廠有 84 家、造船廠 50 餘家、鑄鼎廠 7 家、鐵器廠 300 餘家。⁵⁹顯示在民國初年到民國 38 年之間，福州民間金屬鑄造業非常發達。

前文討論的蓮宅，其地點在今日福州水部街道（福馬路、連江路口）附近，屬福州市鼓樓區東南隅，古城「水部門」（圖 37）。蓮宅村人曾出過近代大文學家林紓，而「水步門」之名由於傍瓊水而建，明代以後改稱「水部門」。蓮宅鑄器可以透過晉安河連接到閩江北港，透過船運輸送大型鑄器。

56 福建省福州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福州市志》第 3 冊，頁 8。

57 福建省福州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福州市志》第 3 冊，頁 2。

58 福建省福州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福州市志》第 3 冊，頁 11。

59 福建省福州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福州市志》第 3 冊，頁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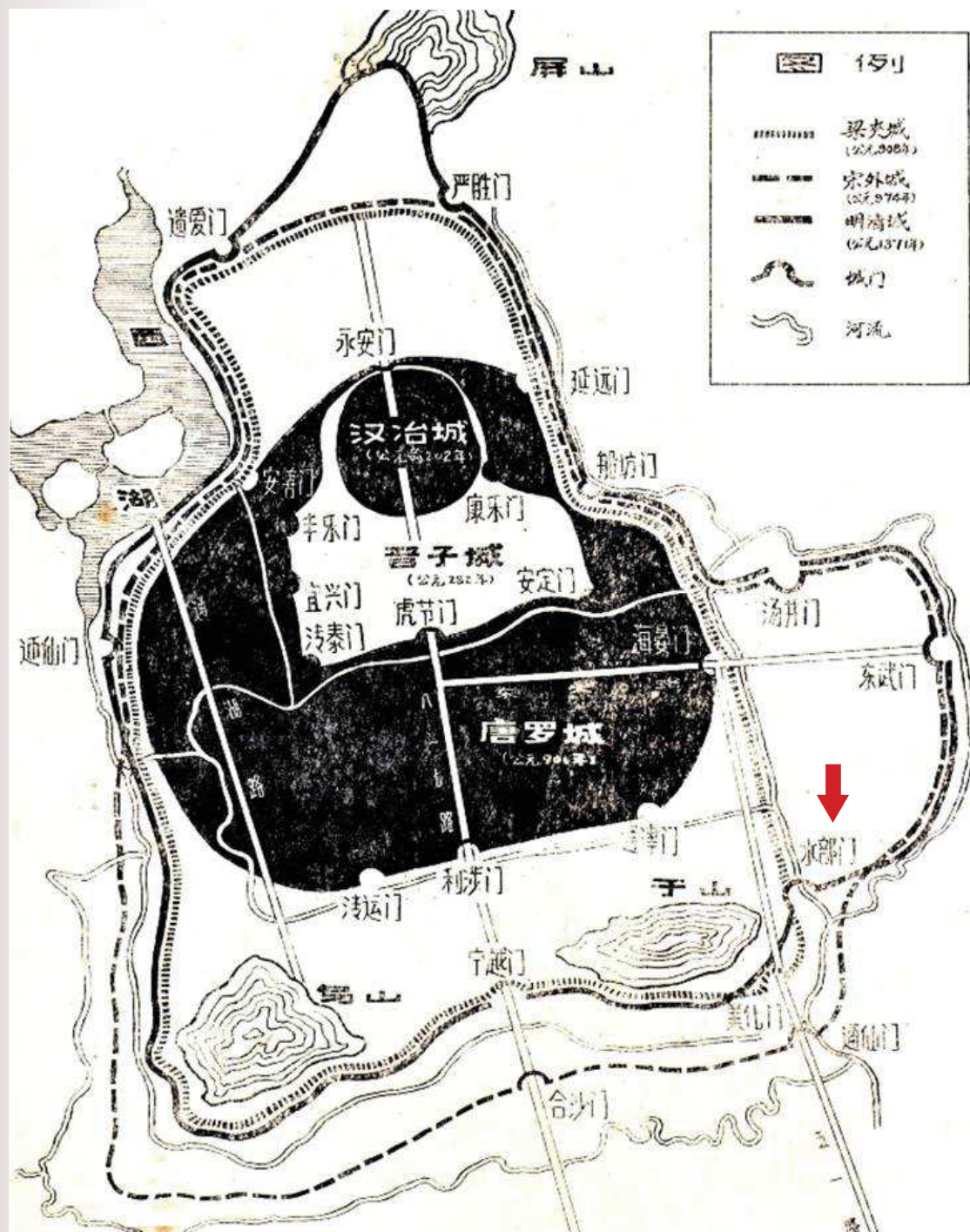


圖 37 福州古代城市變遷示意圖，箭頭處為水部門，即蓮宅所在地，引自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福建省福州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工作組編。

資料來源：引自《福州地方志》（福州：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福建省福州市委員會，1979 年）頁 16。

透過臺灣傳世實物來看，蓮宅鑄造產品對臺的銷售，包括有梵鐘、香爐與火砲（表 4），其年代從最早的宜蘭市噶瑪蘭城隍廟的道光 14 年（1834）的銑鐵鐘、到澎湖光緒 2 年（1873）火砲，其時間範圍落在 19 世紀前半至 19 世紀後半的不及 50 年之間，散布於臺灣東北角、北部、中部、南部與離島（圖 38）。而透過臺灣傳世蓮宅鑄器可知，其出現時間比《福州市志》所稱甚至早 100 年。

表 4：清代臺灣所見蓮宅製品

年款	地點	產品	鑄造者	捐獻者 (訂製者)	資料來源
道光 14 年 (1834)	宜蘭市（噶瑪蘭）城隍廟	鐵鐘	鑄人林國瑚	蔡長青	筆者採集
道光 20 年 (1840)	臺中市犁頭店萬和宮	鐵鐘	福省鑄人林國璉造	協理金春號、總理監生賴應瑞等信徒與商號	筆者採集
道光丁未年 (1847)	金門南門境天后宮	銑鐵方鼎香爐	蓮宅鑄匠林國蒲	未見	筆者採集
道光 28 年 (1848)	臺南府城隍廟	鐵鐘	福建省水關外蓮宅鑄匠林國銓	合郡信官、住持倚億	王國璠編纂，《臺灣金石木書畫略》
	嘉義新港水仙宮	鐵鐘	蓮宅鑄人林俊桂	溫陵眾弟子	筆者採集
道光 30 年 (1850)	新北市淡水古蹟博物館	鐵砲	匠首林茂周	艋舺營	楊仁江，《臺灣地區現存古礮之調查研究》
同治 12 年 (1873)	成大校區	鐵砲	匠首林俊賢、林國琉	嘉義營	盧泰康，《臺南市古物文化資產內涵調查研究計畫報告書》

光緒 2 年 (1876)	澎湖縣立文化中心	鐵砲	匠首林茂昇、副匠首林國琉	臺協三營	楊仁江，《臺灣地區現存古礮之調查研究》
	澎湖縣立文化中心	鐵砲	匠首林茂昇、副匠首林國琉	臺協三營	盧泰康，《臺南市古物文化資產內涵調查研究計畫報告書》
	基隆和平島公園 (1984 年於澎湖馬公港水域打撈)	鐵砲	匠首林茂昇、副匠首林國琉	臺協三營	盧泰康，《文化資產中的古物研究與鑑定》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圖 38 臺灣所見福州蓮宅鑄造產品分布圖，筆者根據 The University Texas Libraries, Map Collection-Taiwan Maps, 1992，標註蓮宅產品的分布地點。

資料來源：網址 <https://www.lib.utexas.edu/maps/taiwan.html>。2019 年 10 月點閱。

實物反映了蓮宅的轉變：蓮宅產品早期以宗教文物為主，鴉片戰爭後此林姓家族也轉向鑄造火炮，其背後反映的正是清廷對抗西方列強之需，僅透過購買西洋武器已不敷使用，更有需要發展自身武器來對抗西方各國的動機。因此，原來以梵鐘為主的林姓家族，轉而鑄造火炮。而且，不論是同治5年創立的福州福建船政局，或是同治7年福州機械局，都顯示官營的武器製造機構的時間都出現得比蓮宅晚。只是這些火炮上都不落「蓮宅」之名，而是林姓某某。不過，福州於清晚期成立的船政局、或是機械局的設置，都是蓮宅轉向鑄造武器的歷史要件。

透過臺灣與南洋鑄器上鑄人的落款，歸納有林國蒲、國銓、國瑚、國琉，其名首字皆用「國」字，從過去宗族社會與職業世襲角度思考，他們即有可能是同一宗族同一輩分的成員，「國」字應是字輩；此外還有「俊」、「後」與「茂」字輩。再歸納南洋發現所有已知落款，鑄人中屬「國」字輩的有林國瑚、林國璉、林國蒲、林國銓、林國琉；「俊」字輩的有林俊桂、林俊賢、林俊雄、林俊琮（南洋）；「茂」字輩的則有林茂昇、林茂周；「後」字輩的有林後祺、林後官、林後銀、林後琮、林後珠與林後往；「光」字輩則僅見林光煥。其中，林光煥在南洋承作了不少光緒年款的梵鐘，儼然成為蓮宅清末鑄鐘的代表。日後或許可透過蓮宅林氏傳世族譜，進一步追溯釐清其輩份關係。

蓮宅的文物，主要是透過個別的鑄人姓名來區別。至於廣東佛山金屬鑄坊，鑄造業則未集中在特定家族手上，而是以店號的形式經營。筆者在澳門寺廟的考察發現，鐵爐來自於佛山的店號有「隆盛爐」、「鉅源爐」、「合記爐」、「信昌爐」、「萬全爐」；梵鐘上的店號則出現有「萬名爐」、「萬明爐」、「隆盛爐」、「萬聚爐」、「安昌爐」、「信昌爐」等。⁶⁰ 佛山冶

60 李建緯，〈澳門寺廟文物種類與形制研究〉，《逢甲人文社會學報》第38期（2019年6月），頁97。

鐵基本單位稱「爐」，設置「爐」的場所稱「爐房」，各「爐」都會加上坊名如「萬名爐」、「隆盛爐」等，若歷史悠久作坊又常冠以「老」字，如「萬聚老爐」、「信昌老爐」等；此外，爐主稱為「爐戶」。明代崇禎年間曾有「審得佛山爐戶，計數萬家」之說。⁶¹ 這顯示佛山很早便形成以店號作為區隔，而非家族，頗有今日透過資本、商店與產品優良來競爭的商業雛形。

蓮宅的鑄人後來仍以翻砂業作為主要職業。甚至蓮宅村還被理解是「翻砂巢」，村里許多翻砂作坊生產鐵鍋、犁頭、磅秤和船用螺旋槳。蓮宅的林氏翻砂，其承包工作方式係設立協會，透過協會外包。協會設有會長、副會長，負責協調各作坊間工作內容與製訂規約。該協會原是規定不能招收外人，後來才打破規定逐漸招收外人為徒，於是林氏翻砂不再只限於林氏子孫所作。⁶²

在臺灣，蓮宅作品何時消失？鹿港天后宮收藏一件三足鼎式金爐（圖 39、40），也是自福州進口。該爐高（含耳）83 公分、口徑 53 公分，鼎式造形，三足為螭虎吞腳；雙耳為昇龍造形，焊接方式於爐身，有接合痕跡，龍首在爐頂上，四爪則貼附於爐身。爐身滿佈銘文與紋飾，全器陰刻紋各以鑄造、鑿刻方式處理。爐口正面橫書右至左「鹿港」、「天后宮」陽文楷體，頸部為「天上聖母」陽文楷體。腹中央飾以淺浮雕盤龍紋，龍首向前，抓一印與珠。右側銘「大正七年（1918）戊午春立」陽文，其中「大正七」三字被刮除；左側銘「福興沈偉欽杜友紹林錦堂林禧灼林禧輝陳金奏吳子和敬獻」陽文。背面爐口陰刻雙龍戲珠，爐頸有「海國安瀾」四字；腹正中銘「卓陞利造」，其中卓字為陰刻字體，其它為陽文；在卓字兩側有「福省」二陰刻字體，字側還有裝飾性雙直行文字，字體難辨，其餘則飾五蝠與彩雲紋。

61 羅一星，《明清佛山經濟發展與社會變遷》（廣州市：廣東人民出版社，1994 年），頁 53-54。

62 未著撰人，〈閩都風土：福州蓮宅林氏翻砂〉，《福州晚報》2018 年 8 月 19 日。文轉引自「福州市林則徐紀念館」，網址：http://www.sohu.com/a/254017957_99904027，2019 年 10 月 9 日點閱。



圖 39 鹿港天后宮鼎式金爐，大正 7 年（1918）。

資料來源：引自「彰化鹿港天后宮媽祖文物館文物登錄與研究計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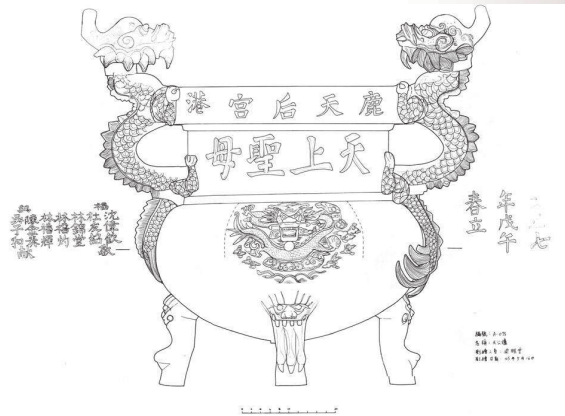


圖 40 鹿港天后宮鼎式金爐線繪圖。

資料來源：梁雅雲測繪。

有關成份部分，三足鼎式金爐的器身成分為銅 Cu（81.68%）、錫 Sn（8.60%）、鉛 Pb（3.9%）、鋅 Zn（2.93%）、鐵 Fe（1.52%）；器身第二個檢測成分是銅 Cu（79.19%）、錫 Sn（7.55%）、鉛 Pb（5.93%）、鋅 Zn（5.01%）、鐵 Fe（1.41%）；器耳的成分則為 Cu（69.01%）、錫 Sn（15.57%）、鉛 Pb（8.28%）、鋅 Zn（4.06%）、鐵 Fe（1.65%）。整體來說，三足鼎式爐屬青銅器。

表 5：鹿港天后宮金爐成分檢測

主要元素成分 % 檢測點	Cu 銅	Sn 錫	Pb 鉛	Zn 鋅	Fe 鐵
器身第一檢測點	81.68	8.60	3.9	2.93	1.52
器身第二檢測點	79.19	7.55	5.93	5.01	1.41
龍形耳	69.01	15.57	8.28	4.06	1.65

資料來源：李建緯，《歷史、記憶與展示：臺灣傳世宗教文物研究》（臺中：豐饒文化，2018 年），頁 130。

從年款來看、工藝與造形來看，該件香爐上是大正 7 年（1918）製作，應無疑義。值得注意的是，鑄造者應為「卓陞利」或「陞利」；兩旁「福省」二字，所指應是在福建省（福州）鑄造（圖 41）。也就是該件三足鼎式金爐，是向福州鑄戶訂製，然後運送至鹿港天后宮。值得注意的是，落款已不見蓮宅或林氏鑄人，顯示蓮宅家族原來在福州具一枝獨秀的地位，逐漸被其它鑄造店號取代，也呼應前文提到福州市在解放軍進入前已出現有鑄鼎廠 7 家、鐵器廠 300 餘家的高峰。此外，蓮宅家族係以生產鑄鐵產品，而此金爐反映出福州除了蓮宅之外，在 20 世紀前半更發展出有色金屬的供器鑄造業。



圖 41 鹿港天后宮鼎式爐具，大正七年（1918 年）。

資料來源：引自「彰化鹿港天后宮媽祖文物館文物登錄與研究計畫」。

伍、結論：蓮宅鑄器作為福州與海外交流的物證

在中國，有許多民間工藝係名不見經傳、甚至已消失。以《中國工藝美術史》為例，該書提及清代金屬工藝僅有景泰藍、銅胎畫琺瑯、鐵畫等以宮廷為主的高級金屬工藝。⁶³ 至於中國各地發展起來技術水平檔次稍低的金屬鑄造作坊，自然不會進入到中國工藝史的大論述中，福州的林氏鑄坊自然也不例外。

過去對於福州與臺灣工藝交流的認識，主要是木雕手工藝，尤其是寺廟的神像雕刻更具代表性。在神像雕塑方面，福州三位大師陳俊樑、林啟鳳、林邦銓都來自福州，有「三條龍」之稱，在 20 世紀前半留下不少知名泥塑神像。福州木雕司阜林發本、林邦銓、林福清、陳錄君也多留下許多精彩的木雕神像。此外，福州木雕匠師在臺灣也留下技術，臺灣的彭木泉、王道瑞、林增桶、古金榮、劉清福、柳長城、柳煥章父子等，都是福州在臺灣形成的木雕工藝。⁶⁴ 除了木雕工藝，福州的壽山石雕與漆藝在清代也傳到臺灣，只是影響遠不如木雕、神像工藝的深遠。⁶⁵ 透過本文研究發現，其實福州曾有不少鑄器傳到臺灣，當中蓮宅林氏匠幫鑄造的鐘、爐與火砲可為代表。

再透過海外南洋蓮宅文物發現到，不論是印尼或馬來西亞，福州蓮宅鑄器以梵鐘為大宗，有落款的梵鐘主要發現於印尼北蘇門答臘、楠榜、中爪哇等地華人寺廟；馬來西亞則以西馬檳城為主，麻六甲也發現蓮宅風格之梵鐘。就福州海上貿易發展脈絡，研究指出兩漢時代已出現，時稱「東治港」，是中國古代海上絲綢之路始發港之一，也是漢唐時期福建最大交通貿易口岸。

63 田自秉，《中國工藝美術史》（臺北：丹青圖書有限公司，1986 年），頁 391-394。

64 陳揚富主編，《福州工藝美術》，頁 68。

65 陳揚富主編，《福州工藝美術》，頁 69。

直到宋代時泉州港的興起、明末隆慶元年（1567）漳州開放月港海禁後來居上，其重要性才逐漸降低。⁶⁶ 透過本文的分析可知，福州林氏蓮宅產品在臺灣、南洋的分布現現，也反映福州在 19 世紀到 20 世紀初對外貿易的地點。

福州林氏家族鑄造的文物，目前已知海外銷售對象多作為華人的宗教用途，如寺廟梵鐘是其鑄造產品的主力。進一步追問的是，若如果從更大的角度來看，原鄉籍貫與其使用物件來源是否存在一定的呼應關係？實際上有不少福建人發起倡建的寺廟所訂製之梵鐘卻是廣東佛山產品，如檳城萬腳蘭福興宮（蛇廟）由福建公司興建，但廟內二座梵鐘鑄銘卻顯示來自於 1886 年廣東佛山信昌老爐所造；麻六甲青雲亭一件由漳籍人士也是擔任青雲亭亭主的薛佛記捐造的道光 12 年（1832）款西洋銅鐘，其上方標示有「Petit et Fritsen me fuderunt」。「Petit et Fritsen」是荷蘭的工房名稱；更有不少福建人建立的宗祠、寺廟使用的銅爐落款來自於廣州市或佛山，而檳城大小宗祠、寺廟中的青瓷斗爐一類文物，更是一面倒地以漳州東溪窯產品為主。上述現象顯示 19 世紀晚期到 20 世紀前半海外華人宗教文物，會隨著產種類不同的品選擇乃而有差異，不僅與產品品質和貿易路線的建立有關，反而未必受制於祖籍或原鄉的束縛。

比較南洋蓮宅文物可以發現，印尼或馬來西亞的蓮宅鑄器以梵鐘為主，反襯臺灣蓮宅鑄器種類的多樣；不過，清末以後臺灣反而未繼續向蓮宅訂製，與臺灣在中日甲午戰爭之後的光緒 21 年（1895）以後納入日本統治，梵鐘逐漸轉向日本訂製有關。本文透過金屬鑄造文物款識與造形的分析，認識到清代晚期福州海外貿易與交流的歷史脈絡，同時也發掘福州一個重要鑄造家族的興起與沒落。

66 聶德寧、張元，《牽星過洋——福建與東南亞》，頁 4-5。

參考書目

一、古籍

- 〔宋〕沈括，《夢溪筆談》，引自林歡編，《宋代古器物學筆記材料輯錄》。
上海市：人民出版社，2013年。
- 〔宋〕趙汝適，馮承鈞校注，《諸蕃志校注》。上海：商務印書館，1940年。
- 〔元〕汪大淵，《島夷志略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
- 〔明〕張燮，《西洋朝貢典錄校注：東西洋考》。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

二、期刊

- 李建緯，〈臺中市萬和宮金屬鐘研究——試論其所反映的產銷問題〉，《文化資產保存學刊》第35期（2016年6月），頁30-67。
- 李建緯，〈澳門寺廟文物種類與形制研究〉，《逢甲人文社會學報》第38期（2019年6月）。
- 鄭東，〈廈門近年出土古砲及明清民海防設施考述〉，《福建文博》（1999年第2期），頁70-75。

三、專書或專書論文

- Claudine Salmon（蘇爾夢）著，〈從梵鐘銘文看中國與東南亞的貿易往來〉，《海洋史研究。第三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5月，頁11-62。
-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福建省福州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工作組編，《福州地方志。上》。福州市：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福建省福州市委員會，1979年，頁16、86-89。

王國璠編纂，《臺灣金石木書畫略》。臺中市：臺灣省立臺中圖書館，1976 年。

田自秉，《中國工藝美術史》。臺北：丹青圖書有限公司，1986 年。

朱培建編，《佛山明清冶鑄》。廣州市：廣州出版社，2009 年。

吳培暉、曾國棟著，《臺灣首廟天壇寺廟生命史》。臺南市：臺灣首廟天壇，2004 年。

宋武、李艷、吳荻帆，《圖說福建傳統手工藝與閩臺文化》。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2018 年。

李建緯，《歷史、記憶與展示：臺灣傳世宗教文物研究》。臺中：豐饒文化，2018 年。

李建緯，〈臺南大天后宮早期金屬香爐年代與形制源流考〉，彭文字主編，《媽祖文化研究論叢。I》。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 5 月。

李興前主編，《檳城鶴山極樂寺》。檳城：檳城極樂寺，2003 年。

陳荊和、陳育崧編，《新加坡華文碑銘集錄》。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72 年。

陳揚富主編，《福州工藝美術》。福州：海峽書局，2010 年。

傅吾康、陳鐵凡編，《馬來西亞華文銘刻萃編》。吉隆坡：馬來亞大學出版社，1985 年。

傅吾康編，《印尼華文銘刻彙編》。新加坡南洋學會、巴黎法國遠東學院和巴黎群島學會，1997 年。

傅吾康編，《泰國華人銘刻萃編》。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9 年。

黃建嵐主編，《龍海縣志》。北京：東方出版社，1993 年。

黃榮春編著，《福州市郊區文物志》。福州市：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 年，
頁 99/141。

黃翠梅、李建緯，《俎豆千古・禮陶樂淑》。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史學系，
2011 年。

楊仁江，《臺灣地區現存古礮之調查研究》。內政部委託，1991 年。

福建省福州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福州市志・第 3 冊》。北京：方志
出版社，1999 年。

盧泰康，〈文化資產中的火炮文物研究：以兩件臺南市藏清代古砲為例〉，
王嵩山、余瓊宜主編，《微物史觀與地方社會》。臺中市：文化部文
資局、逢甲大學出版，2017 年。

盧泰康，《文化資產中的古物研究與鑑定——臺南瑰寶大揭密》。臺北市：
五南圖書，2017 年 7 月，頁 297-302。

薛莉清，〈航向南洋——旅行者南洋空間的丈量〉，《晚清民初南洋華人的
文化建構：一種文化空間的發展》。北京：生活 讀書 新知 三聯書店，
2015 年，頁 97-135。

聶德寧、張元，《牽星過洋——福建與東南亞》。海峽出版發行集團、福建
教育出版社，2018 年。

羅一星，《明清佛山經濟發展與社會變遷》。廣州市：廣東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四、網路資料

未著撰人，〈水部街道〉，《百度百科》，網址：<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0%B4%E9%83%A8%E8%A1%97%E9%81%93>，2019 年 7 月 29 日點閱。

未著撰人，〈閩都風土：福州蓮宅林氏翻砂〉，《福州晚報》2018 年 8 月 19 日。文轉引自「福州市林則徐紀念館」，網址：http://www.sohu.com/a/254017957_99904027，2019 年 8 月 5 日點閱。

"Bellfoundry Petit & Fritse history"，網址：<http://www.petit-fritsen.nl/en/geschiedenis.php>，2019 年 9 月 30 日點閱。

"The University Texas Libraries, Map Collection-Taiwan Maps, 1992"，網址 <https://www.lib.utexas.edu/maps/taiwan.html>，2019 年 8 月 5 日點閱。

The Lin Casting Family in Fuzhou Lianzhai and Its Works in Modern Times Investigation between Taiwan and Southeast Asia

Chien-wei Lee*

Abstract

A large number of Cantonese and Han Chinese from the provinces of Fujian and Guangdong moved to Taiwan since Qing Dynasty; thus they brought with them from their homeland their faith and religious artifacts. At that time, metal casting development was still immature in Taiwan so a lot of religious metal casting products on a large scale were custom-made from the southeastern regions of China. Due to high threshold for this making technique and high price of the products, a donor, as the products were mostly religion related, was often willing to inscribe some information on these metal casting products to demonstrate their piety. That's why now we could benefit particularly from these inscriptions knowing more about the making year and the foundry locations. We notice that among these metal casting products made in Qing Dynasty, there was a foundry from a Lin family, located in Lian Zhai Village, Gulou District, Fuzhou province of China. Based on field research, we found that Taiwan has reserved many artifacts made by the foundry of Lin family in Lian Zhai and their products even exported to Nanyang (Chinese communities in Southeastern Asia), which fact reveals that Lian Zhai

* Profesor & Direct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Artefacts, Feng-Chia University..

formed a unique casting center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Whereas with a lukewarm view of faith and a dramatic change of the types of warfare, these metal casting craftsmen withdrew gradually from the stage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aim of the research was through Lian Zhai metal casting artifacts to identify the craftsmen of Lin family, to clarify the active age of the foundry and to discuss more about sales distribution and metal working methods. There were a variety of metal casting products of Lin family including Brahma bells, incense burners and also artillery, according to the inscriptions that we collected from these cast products. Among the findings, the date of the inscriptions shows that the early products by Lin family were metal cast for religious products but later replaced by artillery casting after the 22th year of Emperor Daoguang (1842). The reflection behind was that Qing Dynasty due to Sino-British Opium War was in an enormous need of weapons while importing from the western countries couldn't fulfill the urgent demand. Besides, Qing Dynasty realized that it was important for the country to strengthen their own artillery casting technology so as to counter the western powers. It was reasonable under this context of history why Lin family which originally focused on making Brahma bells, a category of religious related products, eventually turned to weapons casting.

Further compared to the Lian Zhai artifact products found in Nanyang, whether in Indonesia or Malaysia, Brahma bells accounted for a large proportion. The inscribed Brahma belles were mostly found in Chinese temples, such as in north Sumatra, Lampung and central

Java of Indonesia while in Malaysia, most were found in Penang and some in Malacca. It is worth notice after the end of Qing Dynasty no order from Taiwan for Lian Zhai products. One of the reasons might be that the Nanyang Chinese were not likely to order artillery products; on the other hand, as China was defeated in the Sino-Japan War while Taiwan was subsequently incorporated into Japanese rules in the 21st year of Emperor Guangxu (1895), from then on the orders of Brahma belles were turned to Japan.

Keywords : Fuzhou Lian Zhai, Lin Family, Brahma Bell, Artillery, Nanyang.

